

中文版第二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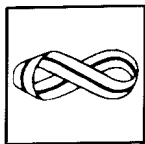
1594-1994

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

論文特輯



BANCO COMERCIAL DE MACAU



**BANCO
TOTTA & AÇORES**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關心澳門請訂閱《文化雜誌》

澳門就是一部文化史冊
它由兩個民族共同譜畫
詩人作家和學者們視通萬里
智慧與靈感令篇章妙彩生花
歷史默默在字裏行間閃亮
人文薈萃使精神熠熠昇華
一頁接一頁請讀者細心瀏覽
良師益友將為未來留下佳話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十一期（第二系列）

1994年第4季度

每份定價

澳門和中國大陸：60元澳門幣或港幣

香港：80元港幣

其它地區1600士姑度／10美元

印數：3000



文化雜誌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版編輯	英文版編輯
黃曉峰	J. 巴斯度
中文助理編輯	葡文版助理
李淑儀	朱立豪
中文版校對	葡文版校對
柳蓮 洪生	F. 利馬 Y. 官雅
編輯部秘書	秘書助理
高蓮達	施利華
美術主任	攝影
馬偉達	鄧顯熙 葉川
中文版美工	葡文版美工
呂照霞	畢必度

編輯部

澳門高地烏街27號二樓

TEL : 512280 / 5993110 FAX : 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新安大廈87 - U

TEL : 700391

代理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32號G

TEL : 305613, 338561 FAX : 314471

電腦植字排版

澳門東堡電腦排版公司

印刷

國安印務公司



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論文特輯

目錄

• 三巴聖蹟 •

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	山度士	5
澳門與耶穌會藝術在中國的發展	利塞依羅	21
澳門大三巴教堂建築師	梅迪納	27
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	馬拉特斯塔	41
利瑪竇的前輩	西比斯	53

• 基督與孔夫子 •

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啟為何會成為基督徒	比得信	73
17世紀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天堂與地獄觀	斯坦戴特	83
論利瑪竇匯合東西文化的嘗試	湯一介	90
“上帝”與“天”	王賓	97
中國與歐洲首次重要文化接觸	孟德衛	105
尋找文化的契合點	瑞爾	113

• 中西文化交流史 •

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黃鴻釗	122
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	黃啟臣	130
清代澳門詩中關於天主教的描述	章文欽	149

• 耶穌會士在中國 •

中國的巴羅克：耶穌會士的聯繫	陳阿瑟	160
西方解釋中國：耶穌會士製圖法	福斯	173
南懷仁與北京欽天監	戈爾韋斯	190
南懷仁“新製靈台儀象誌”	哈爾斯巴戈	199
耶穌會士東行記	狄斯尼	216
路易·范守易和澳門	魯利	226
作為皇家使者的一名耶穌會士墓葬	文德泉	232

• 參考資料 •

澳門進教團	劉炎新 梁潔芬	239
-------	---------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澳門文化司署

OFERTA
GIFT

贈品

封面說明

伊納爾修士。華內派教徒。亦即耶穌教會
雷改革者。基督中心論。追隨基督耶穌才能感
知天主。他們欣然降臨並遍佈人間。

"Vos estis Sal Terrae"。反對消滅極世教
條：一切均為實現萬物歸一：思想、語言和行
動。無論是信徒的、牧人的、文學的、科學技
術的、哲學的還是社會經濟的。巴拉圭、巴
西、印度、中國、日本。黑船上的黑奴。一
種教育。一種建築風格。新大陸的先驅者與開
拓者。近代第一個偉大的高等教育計劃。在文
化中體現的一種博愛的世界末日觀。澳門，
1582年。東西方文化交流。1773年：對我們的
謀殺。處死亞里士多德。安熱利科。蘇亞雷斯
博士。奴隸的保護者如奴隸被遺忘於地牢之
中，但贏得了榮耀。《Ide e inflamoi o
Mundo》(去喚醒世界)是以其名字縮寫用黑
體字發表的關於各大洲的出版物。

《文化雜誌》，第二十一期

論文作者：

山度士
利奧依羅
梅迪納
馬拉特斯塔
西北斯
比馬信
斯坦威特
潘一介
王 賓
王德倫
陸 蔚
黃鴻烈
黃啟臣
章以秋
陳阿芬
潘 新
戈爾登斯
哈爾斯戈巴
狄斯尼
魯 利
文德奧
劉美新／梁潔芬

本期《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表示謝意：

- 感謝美國羅耀拉大學出版社提供《東
西方相遇》(查理·羅南／波尼·柯
主編，1988年出版)一書概允本刊轉
載其中重要論文
- 澳門歷史檔案館
- 大不列顛圖書館
-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 東方基金會里斯本澳門聯絡處



本期封面作品由Daniel do Nascimento設計，其構思乃由蒙
取耶穌會標誌之圖案細節而來，極富象徵性和轉喻意義。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
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
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深葡中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
價值，不拘政治見解；文責由作者自負，其理論觀點並不代
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來稿。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
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
讀者將會垂注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
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三種文版)
的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編者前言

官龍耀

1994年因聖保祿修道院成立400周年而顯得格外重要。這對於在其七座山丘之一建立起亞洲第一所西式大學的遠東上帝聖名之城——澳門來說，恰恰是當之無愧和值得自豪之尊貴的殊榮。

而聖母教堂修道院則可視為一種廣泛的文明交往活動——在戰略上由聖方濟各策劃、范禮安設計與推動並由利瑪竇天才執行的文化融合政策之必然結果。

在三個世紀的時間中，尤其是從1582—1773年，連續幾代耶穌會士在澳門領導了歷史上著名的極其崇高的天主教福音傳播和東西文明相互認知的運動。

至於耶穌會的文化融合政策，德國歷史學家沃夫崗，雷納德認為它是代替歐洲土地擴張之野蠻種族主義的特殊方式。

受到中國政府嘉獎的本世紀傑出漢學家約瑟夫·尼丹認為，耶穌會士在北京宮廷的作用是歷史上所有記載的最典型的文化融合現象。

恰巧，1982年馬賽拉塔紀念利瑪竇到達中國400周年的盛會上，保羅二世教皇斷言，正是“對中國古文化如此廣泛與深刻的瞭解，使意大利傳教士將之變為一座連接歐洲與中國文明的橋樑”。

16世紀末耶穌會士在澳門進行的構思和實踐，時至今日，尚無人能夠超越其上，今天生機勃勃仍然充滿生命活力。

當文化——文明的堡壘從內部大分化的威脅盤旋在21世紀上空時，這種經歷作為跨文化之世界性奮鬥中值得記憶的片斷今天又重新回到了現實。

澳門文化司署的喉舌《文化雜誌》，謹以本期刊專門奉獻給耶穌會，以此表示向他們——在人類歷史上投入各種與文化相關的運動從而令人讚嘆的聚集了具有非凡人文價值的機構和個人，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

崇敬他們即意味著緬懷和紀念過去以及展望與預測未來。耶穌會面對像澳門這樣的國際舞臺的貢獻始終與他們的初創時刻緊密相連，就像幾個世紀以來創立並付諸實施的葡式亞洲市政管理方案一樣。耶穌會是造就這個完全獨立的，由葡、亞商人和居民、廣東商人和掌權階層與耶穌會傳教理想之間形成的有效聯盟的港口城市利益相關的三角形的第三邊。在這個三足鼎立的均勢中，耶穌會是東方社會的穩定力量和對內的巧妙庇護。

今天，耶穌會使澳門永葆活力並富於特色的例子仍然屢見不鮮——正是由於這種活力和特色以及偉大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澳門未來仍然將是中國與歐洲的會通點，永遠是科學、技術和人道主義交往的門戶。



C E N T E N Á R I O
C E N T E N A R Y

聖保祿學院四百週年紀念

1 5 9 4 - 1 9 9 4

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

山度士*

1561年復活節，巴爾塔薩爾·加戈與路易·佩雷拉在返回印度時途經澳門，並於1562年1月1日^[1]啟程前往馬六甲。澳門的葡萄牙居民這時已增加到500或600人^[2]。

這一年的8月24日，又有一些耶穌會教士從馬六甲乘坐D·佩德羅·達·格

拉的船來到新商埠：一位是新近在果阿受命以日本傳教團歷史學家著稱的路易斯·弗羅伊斯，另一位是意大利人若昂·巴蒂斯塔·德·蒙特神父。那時澳門尚無耶穌會教士團的居所，因而他們得到教士團的一位朋友吉列爾梅·佩雷拉的接待並暫住在他家中。吉列爾梅·佩雷拉與迪奧戈·聖方濟各的施主，現在作為葡萄牙船隊長隨同他們一起在澳



從這一樓18世紀末澳門風景油畫細部照相複製件
可看到1835年大火之前的聖保祿教堂
原件屬於香港藝術博物館
選自《大三巴遺蹟：永垂青史的紀念碑》頁151

門，還是印度總督D·弗朗西斯科·科蒂諾，雷東多伯爵派往中國的使節^[3]，是兄弟。

兩位耶穌會士在商人家居居了八或十天。然而，這些日子過去以後“仍然受到挽留，於是承認要研究一些事情”，他們最好搬到另一位朋友^[4]單獨的房子裡去，那裡有“適合兩位神父使用的兩間極好的房間和寬敞的陽

臺”。由於離教堂很近，他們在陽臺上設置了做彌撒的祭壇。這座教堂在當時存在的三座教堂中（花工堂、望德堂和風順堂）應該是1576年1月23日教皇簽發訓令建立澳門教區時^[5]在大教堂之後建立的主教堂（望德堂）。

兩位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非常出色。那時人口已增加到5,000人，有800是葡萄牙人，然而道德狀

* 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S.J., 演說家和作家，在奧森伯爾學習人類學，在格拉納達學習哲學，在羅馬格列利奧納大學學習神學，出版過無數專論文的《布羅特利亞》雜誌社圖書館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他。他是葡萄牙歷史研究成員、葡萄牙考古、歷史及人類研究所和人口學研究中心成員及合作辦公室代理人。

況卻十分不幸。神父管理了兩名在俗教士：“格列果里奧·貢薩萊茲，西班牙人，和若昂·蘇亞雷斯，馬六甲主教的總管。新來的耶穌會教士協助我們使商人們將650名無法調教的女奴裝上前往印度的船隻，而她們的主人則娶個規矩、社會地位相當⁽¹⁾的日本和中國婦女為妻”。

然而這次耶穌會士卻未在澳門定居，因為弗羅伊斯和蒙特於1563年夏初乘同一艘D·佩德羅·達·格拉⁽²⁾的船到日本去了。

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和曼努埃爾·費謝拉神父（聖·方濟各傳記的首位作者）與後來被任命為神父的教友安德列·平托於同年4月⁽³⁾由柯欽出發，6月13日途經馬六甲，第二年7月7日懷著一種新的親善願望，在D·塞巴斯蒂昂派往

中國的吉爾·德·戈伊斯陪同下到達上帝聖名之城。

由於馬六甲兵頭D·弗朗西斯科·德·埃薩的阻撓，這次出使沒有成功。吉爾回到印度，將代替他出使的任務留給了他的姻親，澳門船隊長迪奧戈·佩雷拉和首位出使中國失敗的使節，這時廣州的特許令到達了。

新來的傳教士到哪裡去了呢？弗朗西斯科佩雷斯本人說：“我們正在佩羅·金特羅家”，這是他於1564年1月⁽⁴⁾寫的。

按照日本水手的習慣，弗羅伊斯和蒙特還有佩雷斯和特謝拉他們利用出使中國途中的空閒時間搜集中國的資料並與澳門和廣州港的滿清官員接觸或與澳門居民一起進行傳教活動。但是，出使中國



諾賓·戴塔尼亞神父（1749—1752）：《澳門教區基督教歷史資料》

此為描述聖保祿神學院最詳盡資料之一，作者據其收集的證據為基礎編纂成書，由神學院書店出版。

原自《大三巴遺蹟：永樂書史的紀念碑》頁150

的事變得複雜起來。澳門的滿清官員向廣州的同事發出報告，廣州的官員按慣例派出稅務代辦調查真相，否則就按以向皇上進貢為遲詞⁽¹⁰⁾，審詳議稅處理”。

佩雷斯神父受印度天主教安東尼奧·德·夸德羅斯（1559—1572年）的委托，去澳門處理已準備好的一幢居所的地基問題，⁽¹¹⁾當時是那樣需要這幢居所，因為經常有船送傳教士前往日本，而等待季風迫使出行者要在那個商埠停留很長時間。

實際上，1563年還有三位耶穌會教士也到達了那裡：貝爾基奧爾·德·弗格雷多、若昂·卡布拉爾和巴爾塔薩爾·達·柯斯塔。1560年頒佈了比奧四世教皇的大敕令，該命令於1561年在馬六甲公佈時，正值第一任修道院長D·Fr·若熱·德·桑塔·盧西亞到達那裡。根據上述總管若昂·蘇亞雷斯所說⁽¹²⁾，第二年命令就擴展到了澳門。

耶穌會教士居所的小禮拜堂⁽¹³⁾由於這次大赦的恩惠，成為道德革新的中心，有300葡萄牙人使用它，另外還有許多人把主教堂⁽¹⁴⁾作為中心。

這時從廣州新來的耶穌會教士到達了。由於將偷小孩的罪過歸咎於葡萄牙人的緣故，對那裡的印象很壞。為此，派去的滿清官員想竊取出使者的詳細情報及其隨行的人員和向皇上進貢物品的清單。他被帶到船隊長迪奧戈·佩雷拉。尚未從澳門啟程的使者吉爾·德·戈伊斯和神父們的家。他命令將貢品陳列在耶穌會教堂給他看，聽似乎有點太

CHRISTIANI PVERI INSTITVTIO,

ADOLESCENTIÆ Q.VE
peritiam: auctore Ioanne Bonifacio
SOCIETATIS IESV.
cum libet unius, Scribitur accessione plurimarum.



Cum facultate Superiorum
apud Sinas, in Portu Macensii
in Domo Societatis IESV.
Anno 1588.

澳門出版第一部拉丁文著作《天主教教育牧學院，孤兒院》
作者耶穌會士尤阿納·波納法西奧於澳門港耶穌會會址
1588 16cm

源自《天下巴達考·永盛尹史的紀念碑》頁150

大。在教堂裡他舉止彬彬有禮，對珠寶喜形於色，對除物品之外用罐頭冷飲和辭謝宴會給予之款待也表示滿意，並且開始秘密交談，說已發現偷小孩的不是葡萄牙人而是中國人，他們已在廣州被投訴，並有四個人被判處死刑。

回到中國大陸後，他保護了葡萄牙的利益。1565年11月24日，允許曼努埃爾·佩納多由佩雷斯和特謝拉神父陪同接洽外交使命之事。但是，正如承認大使在馬六甲的一次大火中被燒死的憑證所述，沒有任何結果。

佩雷斯神父力圖至少獲得在大陸往來通行的“票”（入境許可）。為此他向海關總司庫官，也

是外貿代理人提交了一份葡雙語備忘錄，要求准予進入大陸。當問到他是否懂得漢語時，教士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看到請求遭到拒絕，於是就學習了當地方言。⁽¹⁵⁾大門仍然這樣死死地關閉著。新的希望出現了。這次嘗試後不久，廣州遭到海盜包圍。滿清官員向澳門的葡萄牙人求救，而這些葡萄牙人未向當時的船隊長若昂·佩雷拉請示就武裝了一支300人的隊伍，由迪奧戈·佩雷拉和路易斯·德·梅洛率領，沒有任何損失就俘虜了差不多所有的海盜。聖方濟各的朋友於是向該市的軍事頭領要求支持出使朝廷的外交使命，但他忘恩負義拒絕接受這種出使，而滿清官員也不能再保證與廣州交通往來的便利了。

在這種情況下，佩雷斯誠實按照印度天主教

目的定為：把澳門作為前往日本漫長旅途中的停留休息站；在適當時機進入中國的等候室，和對其貿易蓬勃發展導致人口迅速增長的東方商埠的道德拯救中心。

1565年底，教士團的居所從佩羅·金特羅家遷到了同樣也是用水頭和草蓋的簡陋的花王堂小禮拜堂附近的另一些平房裡。這個地方很糟糕。不久就看出必須搬走。所供給的燃料經常被中國人拿去放火燒住所與聖殿，目的是偷盜其中的財物。葡萄牙人重建居所的行政狀況十分困難。而重建常常要取決於中國官員的意見，他們反對安置設施超過貿易往來的直接需要。

儘管如此，耶穌會教士仍想碰碰運氣，他們搬到了花王堂小禮拜堂的上面。糟糕的是山坡上沒有水。但巴爾塔薩爾·德·拉熱贈送了100兩銀子在塔與經過教堂的門之間打了一口井⁽¹⁸⁾。應巡視員貢薩洛·奧瓦雷斯希望用泥磚重建一個更寬敞與更結實的教堂的請求，在D·安東尼奧·德·維列納的參與下於1573年建起了一座教堂，所以那裡的教堂也是用水頭和草建造的。後來，由於懷疑耶穌會教士隱瞞修築某個砲臺的事，滿清官員查封了工程。

雖然有充足的理由並為把一切搞妥當進行了賄賂，但正如塞巴斯蒂昂·貢薩爾維斯所說的，佩雷斯和特謝拉最終還是停下來了⁽¹⁹⁾。

1572年至1575年或1578年間，再次擴建了各種設施，以便大量過路前往日本或中國與東京的客人在此停留。當時這些地方的傳教活動都已開始。它們由十間寬敞的和與教會相應之廳堂空氣對流的房間組成。1579年瓦利格諾把聖母堂的新居所評價為印度省在這東最好的居所之一實在

是太恰當不過了⁽¹⁸⁾。1582年，佩羅·戈麥斯為教堂蓋上了屋頂瓦⁽¹⁹⁾。

對年幼者的基礎教育

耶穌會教士很快就為神父的職責增加了教育這項工作，從其學校一誕生，他們就把各個方面的事放在心上，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海外。

在澳門，可能在最早進行的擴建之後，他們於1572年首先從一所讀寫學校開始⁽²⁰⁾。幾年以後，增加了拉丁文課⁽²¹⁾。學生人數迅速增加。

1592年，在澳門商人的子女和他們抓來帶在身邊做事的孩子⁽²²⁾中就約有200人，這種情況構成了在當時就已刺激葡萄牙向遠東擴張的社會-人種一體化時代精神的又一份資料。

在這一年，亞歷山大·瓦利格諾諾在長崎主持的第三次傳教士總協商會議之後，於2-6月之間召開了第一次副主教大會⁽²³⁾。在這次會議上認為有必要為日本和日本以外的耶穌會教士建立一所修院。內戰的騷亂影響了年輕一代，並危及了學習與苦修訓練的安寧。另一方面，他們祇有與西方環境接觸才能徹底成為基督徒。總

之，就是澳門葡萄牙人的方式：學習模仿歐洲人的語言、習慣和樣子，“變得更團結、對其它人有愛心以及在道德和學問上十分傑出”⁽²⁴⁾。

澳門處在遠東的中心，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理想地方。日本傳教團代理人支配著在上帝聖名之域積蓄的一些財產，這些財產使他看到了建立新根據地的希望，沒有甚麼能阻止他這樣做⁽²⁵⁾。會議決定立即著手建立這一新根據地，越快越好。

巡視員瓦利格諾諾10月9日啟程前往澳門，24日⁽²⁶⁾到達那裡。當他在聖母堂等待前往果阿直到



大砲臺平面圖 1740 水彩畫 17x22cm

砲台（大三巴牌坊·永豐書局的紀念碑）頁125

1594年11月15或16日時，他將方案告訴了司法權限屬於澳門的中國傳教團的神父們。動議是口頭提出的。實際上，這個傳教團的領導，聖母堂居所修道院院長杜阿爾特·桑德神父（1585—1598）已考慮過這項工程。原有的設備即使用做走讀學校也已很狹窄和不方便。學生們摩肩接踵“有失體統”。第二年2月⁽³²⁾他提請市政委員會考慮。鑒於貿易活動帶來的人口增長和經濟繁榮，為甚麼不像果阿的聖保祿修院作為整個印度乃至馬六甲和莫魯卡斯、東非和埃塞俄比亞的中心一樣把遠東看作一個文化傳播中心呢？澳門人根據著名的果阿修道院的來源稱呼耶穌會教士，這難道不是對受到這種精神鼓舞建造修道院這座建築物最適當的提示嗎？而且充份擴大設備不僅能使澳門增加當地青年在校學習的願望提前實現，而且能使聖母堂成為一個從日本到中國⁽³³⁾、東京以及全世界以此為目的其它國家傳教士的培訓中心。適合建立新學院的土地曾經是一個問題。幾經努力，它就定在山坡上離居所-修道院不遠的地方，“都是很大的岩石，沒有可以打地基的平地”⁽³⁴⁾。儘管工程造价很高，但位置有益健康，風景迷人⁽³⁵⁾。用這些岩石和切割好的石頭在陡峭的山邊建造了巨大堅固的牆，這座牆圍成了一個很大的、非常平坦和舒適的場地，這樣就建造了一座有舒適庭院的修道院。而且由於修道院座落在半山腰上，可以極目遠眺和沐浴來自海上與其它地方的習習清風，有山阻擋各種各樣令人不快的強風，因此修道院處

在十分涼爽的好位置”⁽³¹⁾。

那麼誰來建造它呢？葡萄牙人都是經商的，而城裡的中國人很少有會做大工程的。幸虧離這裡100里格的青洲有熟練石匠當時來到澳門⁽³²⁾。

口頭上聘約了工頭伊納修·莫雷拉⁽³³⁾，並繪製了修道院的藍圖，就開始平整土地和打地基。由於可支配的資金有限⁽³⁴⁾和不把建造修道院僅僅作為培養傳教士的問題而且也是對澳門青年的教育問題來看待，桑德神父向市政委員會請求幫助。修道院的領導對市政委員會說，夏天許多人擠在一起不僅不雅而且也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有益於日本傳教活動的工程處理，他請求市政委員會從資金與那年裝船運往日本的絲綢收入中抽出200兩銀子作為援助⁽³⁵⁾。市政委員安東尼奧·達·科斯塔、維利烏·弗朗斯科·德·諾瓦里斯·費雷拉和安德·卡爾德伊拉和民政長官員納迪諾·阿勞若·德·奧瓦林加一起批准了請求，由書記官加斯帕爾·達·羅莎於1593年2月27日記錄在冊⁽³⁶⁾。

不久，米格爾·蘇亞雷斯神父要求這些貸款，桑德神父答應他3月4日付給。還需要追加30兩銀子的款項，工頭伊納修·莫雷拉聲稱已於7月7日收到。⁽³⁷⁾

然而這項動議沒有得到無條件的援助。滿清官員反對也沒用——即使他們反對，像往常一樣，用上好的銀條進貢也會息事寧人⁽³⁸⁾，而最激烈的反對來自果阿省。當得知設計方案的消息時，他們開會商量並拼治了一份有15條不應興建耶穌會教士廟澳



以大砲臺為背景的石板堂修道院
 繪者：錢納利的羽毛筆畫 12.7x17.8cm
 源自《大三巴牌坊：永載青史的紀念碑》頁132



喬治·錢納利作品：板樟堂（1825）鉛筆稿 16.5x19.6cm
 摘自《大三巴牌坊：永垂青史的紀念碑》頁130

門修道院的冗長文件⁽³⁹⁾“連諳熟日本事務的專家弗朗西斯科·卡布拉斯本人也在一些觀點上不同意瓦利格納諾的所有想法，與將日本修道院遷往澳門的建議有不同意見”，從其中偶然可以看到一個西方文化的進程⁽⁴⁰⁾。由於他對里斯日本事務的行政長官曼努埃爾·維耐加斯神父的影響，事情甚至驚動了王室，菲利普二世命令印度總督和果阿副主教⁽⁴¹⁾說明修建修道院的必要性⁽⁴²⁾。

瓦利格納諾並非輕易放棄的人。為了化解與果阿的矛盾他給熱拉爾·阿夸維瓦（1581-1615）送去了《關於建造澳門修道院與答覆印度省反對意見》⁽⁴³⁾的詳細資料。主要內容是這樣的：果阿的援助，……由於存在著多家公司，人手不夠，又難得相當遠，援助常常較少，而且不能持久，也很遲緩⁽⁴⁴⁾。

在巡視員的推動下，工程加快了速度。“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所有的施工”⁽⁴⁵⁾。建築物不乏雄偉的氣勢。1594年的“年終報告”給我們作了生動描寫：“重新建造了修道院與院子，修起一堵圍牆，有兩間大房子伸出牆外，兩間房子

之間是一個漂亮的庭院；兩間像城堡一樣伸出去的房子都是木板地，圍牆處有一條連著修道院臥室的走廊，它的地面比在同一層的兩個房間的地板要高出很多。山腳下，通過兩三段樓梯與山谷相連的地方是學校和它的院子及通往其它辦公室的大門，走過山谷還有另外一些非常舒適的職員臥室。門衛室往前是另一個封閉的大院子。這樣，這個修道院就可以很從容地容納四十個人的教士團；因為除了學校的房間以外，在山谷處還有十九間臥室、兩間廳、兩個小禮拜堂和一間寬敞漂亮的病房；而在下面，還有另外七間臥室連同十分舒適的辦公室，但是巡視員神父仍決定建另外一間新食堂，因為現在我們用的食堂是借的。如果需要，我們還有很大地方再做其它建築”⁽⁴⁶⁾。

澳門的居住者被這種熱情感染，以至既未花費日本的錢也未用教士團分文就完成了所有這一切⁽⁴⁷⁾，祇在新廟臺到病房的工程中用了10,000兩銀⁽⁴⁸⁾。

• 瓦利格納諾在離開澳門之前，建立了兩個有

名的團體⁽⁴⁹⁾。與中國的省教區有關的聖母堂居所共有教士團的十名修士，以聖保祿修道院的洛倫索·梅西亞職位最高。那裡的人員最多達到過十九名教士團修士，包括巡視員和另外八或十名日本與印度學生，杜阿爾特·德·桑德神父擔任院長⁽⁵⁰⁾，它不受日本省管轄。離得近方便了兩座建築物內部的交通，因而也方便了集會。這次集會最終決定於1597年9月曼努埃爾·迪亞斯神父任職院長時召開，並將命名含糊不清的聖母和聖保祿的居所與修道院合併為一個機構⁽⁵¹⁾。

這種情況最終由於兩個建築物互相之間得到的益處而得到保證。實際上，1595年在洛倫索·梅西亞做院長時，1578年的居所已被大火吞噬，後來又在教士團的菜園裡重建了一座⁽⁵²⁾。1601年，在1835年又以無可挽回的方式重蹈覆轍的悲慘命運中，另一場大火焚燬了教堂和剛剛被一場颱風破壞了的修道院⁽⁵³⁾。瓦倫廷·德·卡爾瓦略院長（1601—1604）組織了一個居民救災委員會。由船長倡議，澳門捐贈了對日貿易收入的百份之五十，相當於6,260法蘭西圖爾鎊，並委託熱那亞耶穌會教士卡洛斯·斯皮諾拉、建築設計師和後來的日本殉難者⁽⁵⁴⁾進行設計。規劃相當大膽以至於《明史》後來承認整個中國從未有過如此宏大的建築⁽⁵⁵⁾。在重建中突出了價值來自佈施的32,000澳門圓的雄偉牌坊⁽⁵⁶⁾。1603年，內部工程竣工，並用以前放置在建築物一轉角處的“*Virgini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 posui anno 1602*”⁽⁵⁷⁾這段銘文突出了該市對藝術建築物的保護。與教堂毗鄰的修道院大門完工於1604年。建築物的前部到1637年才完工，而且直到1644年才補齊上面的雕刻。1608年還曾對教堂主體進行過修飾，聖方濟各小禮拜堂完成於1689年。⁽⁵⁸⁾

隨著時間的推移，聖殿逐漸擁有許多珍貴的器物 and 無數遺物，但並非所有的都是真的。或許在意大利風琴和歐洲、中國及日本藝術家的繪畫作品中要突出賈科伯·尼瓦和耶穌會教士、意大利人日奧瓦尼·尼古洛的另一些門徒，他們使步入聖殿的信徒甚至異教徒賞心悅目。路易十四贈送給法國國

耶穌會教士的大鐘以其巨大的機械裝置為全城指示時間⁽⁵⁹⁾。

1594年10月28日以前，修道院有四個班級：一個有250多個學生的讀寫班，另一個是語法學班，還有一個是那年新開的人文學班，除了外來的學生，還有七名來自印度的耶穌會教友。這些班級中還有一些日本和果阿等待於1596年開設的第一個藝術課程班的學生。此外還有實例課（倫理神學）⁽⁶⁰⁾。

“久而久之，在上帝的幫助下和隨著巡視員神父的重返舊地，人們明白了，是否再增設一些班級和其它重要的學科更好”⁽⁶¹⁾。那時還沒有教義神學公開課；但私下裡由修道院裡兩位由中國傳教團負責的神父教授⁽⁶²⁾。

兩個團體正式分家是於壹萬壹仟貞女日（1594年10月21日）在巡視員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一位神學修士支持了神學公開論點，並以一篇拉丁文演說開始了新修道院開幕的隆重儀式，“獲得主教大人和整個教會及許多出席儀式的重要人物的好評”⁽⁶³⁾。12月1日在新修道院內開始上課⁽⁶⁴⁾。

初級和高級課程的重新組織

瓦利格納諾於1594年1月中旬啟程前往果阿。1597年4月23日回到遠東，並於7月20日在澳門登陸，在那裡一直逗留到1598年7月中旬⁽⁶⁵⁾。修道院仍然使他記掛在心，而獲得的成績激起了他的興趣。在制定規章和簽署協議中卓越的組織才能，使他自然而然以1591年⁽⁶⁶⁾由阿夸維瓦在羅馬《*ad experimentum*》上發表的“*Ratio Studiorum*”為基礎努力給予聖保祿這個宗教與教學機構一種新形式的生命，然而卻帶有1559年和1565年⁽⁶⁷⁾科英布拉藝術學院明顯的暗示和與東方有關的成份相當複雜的道德氛圍、氣候、種族及文明狀況強加給它的某種適應性，以便得到積極的結果。

因而瓦利格納諾在這年10月為學校制定了一種新秩序⁽⁶⁸⁾，序言是這樣說的：“因為這所修道院現在已經開始上課，而在學習中還沒有建立良好

的秩序。在這裡讀書學習的碩士生和教友來自不同省份，在校期間有不同習慣。這樣，如果學校裡沒有良好的秩序就容易造成嚴重的混亂。而對於每年的新變化似乎還應根據該所修道院裡學生與班級的數目⁽⁶⁹⁾，除要付諸實踐的“Ratio Studiorum”中規定的以外，對在學習中遵守一切能夠遵守的東西作出規定”。

學生按照比奧四世教皇的方式做過彌撒後，學年於9月15日在教堂隆重舉行的教育行政長官、教師和候補人的信仰宣誓拉開序幕。

穿著敬領衣的院長和老師出席了上午7時開始的拉丁文課，第一篇課文是15分鐘的當地方言的簡短演說。在下午開始的課上也如此一番。

在信仰宣誓中，在辯論中，在演講及所有公開的語言活動中，座位都是按照批准的等級和有關天主教的代表性標示的。當院長和教育行政官出席時，二者就成為特殊尊崇的目標，並要向他们請示以分別按照 *Rector religiosissime*, *Gymnasiache integerrime* 的方式開始。如果主教或船隊長到場，他們也有權用同樣的方式。

在辯論中，當辯論者開始辯論時，應贏得院長、教育行政官和其它聽眾的好感，他們就會接受辯論者。他們提出的論點在公佈之前都要預先向教育行政官說明。

開始與結束上課都要跪在置於校園內的崇拜聖像面前用簡短的語句祈禱。

師生之間問候按照當時流行的禮節進行。

學生，即使是俗人，他的精神生活也要受到教師的特別關注。七點鐘敲鐘上早晨第一節課，九點半時也要一樣敲鐘下課。對於上午的其它課，祇作上下課時間登記。下午的做法一樣。

對學生來說，禁止在校園內或任何一間教室內攜帶武器⁽⁷⁰⁾。

假期及休息的天數也有規定。

神學、倫理學、藝術課及拉丁文一年級的假期從7月14日上午開始，到9月14日結束。低年級的假期持續一個月，從8月14日到9月14日。

在沒有聖日的時候，假期或周休息日為星期

三。如果遇到聖日，休息日就改在星期四。如果周六是聖日，則仍在星期三休息。其它日子也像假期一樣計算。聖方濟各日不上課，其它聖日的安排與這天一樣。

聖誕節前夕的下午，狂歡節的星期一與星期二，聖灰星期三的上午的聖星期三直至復活節及在修道院教堂內唱晚課或晚禱的所有下午也都是假日。耶穌受難日、天主教大教或節日在任何教堂都不停課⁽⁷¹⁾。

學校的作息時間，無論對拉丁課還是藝術課，倫理學和教義神學課都作了詳細規定。

在拉丁文班，教師每早閱讀兩個半小時（七點至九點半），下午兩個半小時，星期六祇讀一個半小時。

冬天，11月8日聖灰星期三，由於白天短，下午的課從兩點半開始。在拉丁文學年的日子裡，下午，耶穌會學員一旦完成懺悔日或教化實踐日緊張的聖徒禱文之後，就要進行45分鐘的默讀。

教俗人弟子的拉丁文教師，星期六下午趕著離開教室前的一會兒，還要和他的學生們一起站在廳內的聖像前祈禱聖母禱文。

當在課堂上提問時，都不會忘記師生之間的禮儀規矩。如果學員是耶穌會教士，他們在被提問時都要脫帽起立，老師也摘掉他們的無緣軟帽並讓學生坐下和戴上帽子回答問題。在俗學生也脫帽起立回答功課，如果教師沒有察覺，就用“你們”來稱呼。

修辭學學生或辯論的正方，無論是耶穌會教士還是俗人，都要脫帽坐在教師的椅子旁邊，而且在宣讀論述時也要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如果要當眾宣讀這些論述，就要穿敬領衣戴帽站在椅旁朗讀⁽⁷²⁾。

和在埃沃拉或科英布拉一樣，藝術課在1597年就達到了大學水平。開幕式以題為“採用方言的必要性”的學術講演和簡短的預備發言的形式舉行，院長、教育行政官和其它教師都出席這個開幕式。由於不對論文進行評論，上課用一個半小時（上午8-9點；下午3-5點）。對論文進行評論的課上午用兩個半小時，下午用兩小時。

每星期四下午都要進行課堂辯論，由兩名學員為根據前一天課程確定的論點或論題進行辯護，並與其它人辯論。每月進行一次。這種辯論非常鄭重其事。兩天前就在班裡或修道院內說明要辯論的論點，而且院長、教育行政官、教義神學和倫理學的老師以及神學學生都要參加。

教士團的宗教藝術家，祇要下午有課和不是懺悔的日子，就要用45分鐘時間進行教化辯論，為此在課間15分鐘時搖鈴，並由一名神學學生主持辯論。

在藝術課上提問質疑也要有禮貌。在俗學生如果沒有聖職就脫帽坐著講課文和爭論。所有的人說脫帽坐著參加爭論。老師用「你們」稱呼沒有聖職的在俗學生。

課程的期限為三年，結業時要面對三位考官，由其中一名主持公開考試，並在四項考試或考查的第一項中作與考試有關的簡短發言。在課程表安排的時間內，這四項考試的每一項都要用一整天。質疑的內容包括整個邏輯學，即一般概念、範疇學，《Perihermenias》或《釋義學》的第一冊，《邏輯分析學》第一冊（前）、《邏輯分析學》第二冊（後），《立論》或真理證明資料來源，《詭辯術》或論證無效方式，最後還向應試者提出一個錯誤的推理，請他說明論證的毛病與錯誤。

除此而外，藝術大師候選人要為由三名考官立論的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問題進行辯護，還要說明與邏輯論點之一有關的每一個疑問，同樣還要討論其它哲學學科的問題。

考試的場面籠罩著特別莊嚴的氣氛。安排了三排高凳給院長、教育行政官、主考官和兩位考官坐，在他們後面是教義神學與倫理學等學科的教師。藝術課不在考試之列。神學學生，其它職階的宗教人士還有在俗文案也可以參加。

藝術課程考試的第一次口試⁽¹³⁾也應該以這種方式進行。

教室裡為院長和考官裝備了座椅。考試開始時有音樂伴奏，氣氛十分莊嚴。主席團主席作了簡短發言，講話結束後樂師開始唱歌。接著是應考者

脫帽起立所做的一段關於考試的講話。講完話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這時音樂再次響起。此後，應考者走過來，評判委員會主席親自開始所說的考試，並提出問題：“Religiose et perdocte respondens”（如果是耶穌會教士）或“Ingenuose ac perdocte respondens”（如果是俗人）。“Pro initio tui examinis, responde quaestionibus solitis et propone tuum physicum et metaphysicum problema”。對這一問題，應考者起立反駁：“Sic jubet, Sapientissimus et religiosissimus praeses, ut pro initio mei examinis respondeam quaestionibus solitis et proponam mea physicum et metaphysicum problemata. Quoniam sic jubet, mihi nomen est NN, patria N.”如果是教士團的宗教人士，方式就被改為這樣：“Mihi nomen est NN; pro reliquis, Societas Jesu”。接著：“Audiui amnia requisita ad praesens examen a sapientissimo et religiosissimo praeceptore, meo parte N”。說過這些後又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Meum Physicum problema petit(v.g.): num totum physicum distinguatur realiter a partibus simul sumptis, annon? Ego teneo partem affirmativam. Nunc, idem metaphysicum problema petit(v.g.): utrum omnes actiones sint suppositorum, cui ego respondeo per has propositiones: 1^a Propono: Actiones proficiscuntur a suppositis, vel ab agentibus quo: 2^a Propono: Actiones terminantur etc”提過問題後，主考官開始用這種方式對一般概念進行考試：“Religiose et perdocte respondens, pro doctrina Praedicabili, dic quot sint Universalia?”

應考者回答：“Sic jubet sapientissimus et religiosissimus praeses”等等。當主考官對一般概念問得差不多的時候，就改為由首席考官用同樣的方式對範疇學問題提問，接著由第二考官提問《釋義學》問題，再由主考官對《邏輯分析學》（前）提問，以此類推，直到邏輯學所有問題考完為止。邏輯學考試結束後，每位考官都要提出與應考者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相反的論據。